

奥古斯托·庞齐奥的符号学与语言哲学

苏珊·佩特里利著
王璐译

一、游弋于语言哲学和符号学之间

奥古斯托·庞齐奥 (Augusto Ponzio) 1942年2月17日出生于意大利的圣彼得罗韦尔诺蒂科。他学术生涯的多数时间都致力于符号和语言学科的研究,从他完整的参考文献中可看到他的学术著作数量之大,令人难望其项背。仅从专著上看,庞齐奥一人就出版了120余本(参见本文末庞齐奥的书目)。20世纪初,在乌尔比诺大学国际语言学 and 符号学中心举办的年度暑期系列会议的其中一场,任该中心长期主席的朱塞佩·派奥尼 (Giuseppe Paioni) 这样评价道:奥古斯托·庞齐奥的创作是前无古人的,其研究兴趣之宽广,话语体裁之灵活,其对话性研究方法之开放,可与狄德罗相比肩(与笔者的私人沟通)。派奥尼建立了该中心,同时他也是一系列历史悠久的,至关重要的,久负盛名的国际型会议的组织者,其中像翁伯托·艾柯 (Umberto Eco)、茱莉亚·克里斯蒂娃 (Julia Kristeva)、罗兰·巴尔特 (Roland Barthes)、罗曼·雅各布森 (Roman Jakobson)、罗西-兰迪 (Ferruccio Rossi-Landi) 等等,许多符号学领域首屈一指的人物都是参与者。

庞齐奥在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研究的当代是标杆性的人物。“语言哲学” (philosophy of language) 这一表述显示了庞齐奥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从语言哲学的角度解决与符号学相关的问题,追随近期符号学的发展趋势,其研究方向也与时俱进地由语言学转向了生物符号学。严格说来,他的方法与一般符号学相关。尽管如此,庞齐奥在批判和基础原理的探究方面实践来源于他语言哲学作品的普通符号学。

作为符号学的批判,庞齐奥的一般符号学解决了人文学科与逻辑数学和与自然学科间表面的分离。他的符号学研究涉及不同学科,根据最好描述为跨学科性的一种研究方法,但就庞齐奥而言,“无学科性” (undisciplinarity) 更为贴切。庞齐奥提出,普通符号学坚持对意义的哲学探寻,正如他对意义的探寻坚持他在导师朱塞佩·塞梅拉里 (Giuseppe Semerari) 的教导下最初形成的现象学方向。因此,事实上,这不仅证明了学科间互相关联,也是被理解为我们中每一个的单一主体的人的意义的问题。这符合了埃德蒙德·胡塞尔 (Edmund Husserl) 及其后继者如伊曼努尔·列维纳斯 (Emmanuel Levinas) 和莫里斯·梅洛-庞蒂 (Maurice Merleau-Ponty) 的研究。胡塞尔关于“精确科学” (exact science) 和“严格科学” (rigorous science) 的区分,为庞齐奥对人类意义探寻的一般性科学研究尤其是在一般符号学方面,确定了方向。庞齐奥在研究中延续这一特定方向,形成了“伦理符号学” (ethosemiotics), “终极” (telo-) 或“终极符号学” (teleosemiotics) 的概念,以及新近在与笔者合作的研究中发展而来的“伦理符号学” (semioethics)。研究的一系列作品包括与笔者合著的2003年出版的意大利文版《符号学》 (Semioetica), 2005年出版的《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以及2010年在保罗·科布利 (Paul Cobley) 编辑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一书中英文版伦理符号学的条目。我们对符号学中伦理符号学的阐述是从病状学 (semeiotics/symptomatology) 的概念发展而来的。

他研读米哈伊尔·巴赫金 (Mikhail Bakhtin) 的作品,特别是与托马斯·西比奥克 (Thomas Sebeok) 的私交的影响,庞齐奥关注生命与交流,符号和价值的关系。在西比奥克的影响下,庞齐奥确定了起源于医学符号学或病状学的符号学。病状学把符号学即一般符号科学置于从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发展到盖伦（Galen）的传统中。这不仅仅是关于知识的起源的问题。将符号学与医学学科即症状研究学结合起来，也就意味着恢复符号学研究的伦理上的实例。换言之，鉴于符号活动与西比奥克所说的整个地球上的生命的交汇重叠，它意味着为了生命健康而复兴“病状学”（semeiotics），及时关注符号学科古老使命。这些议题蕴含在庞齐奥与笔者合著的不计其数的论文中（大多为英文版）。当然也包括与笔者合著的几本书中：2001年《托马斯·西比奥克和生命的符号》（Thomas 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和2002年《病状与生命：托马斯·西比奥克的全球符号学》（I segni e la vita. La semiotica globale di Thomas A. Sebeok）。无论如何，“伦理符号学”（semioethics）并非旨在建立专门的学科，而是作为符号学研究的一个视角和方向。庞齐奥研究符号学的伦理上的实例最初是由他1966年在大学教授道德哲学的课程发展而来的，此后自1970年担任语言哲学系的教授，1980年任全职教授后中断该课程的开设。

庞齐奥所理解的“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是指把语言作为主体，哲学化的语言而不只是哲学对象的语言。语言学科的研究以独白式方向并受语言学的向心力聚合力的控制时，内在于语言的哲学化的原始能力和其组合式的对话杂语很可能被畸形化、被误解、被扭曲，尽管努力的方向相反，最终与本身内涵和表意背道而驰。要是没有这种原始能力，把语言客观化或发展语言研究的哲学或语言学的学科便是无稽之谈。

正如语言哲学不能从一般符号学中分离一样，一般哲学也都不能与语言哲学中分离。而语言哲学和一般哲学都不能忽视对话杂语这一现象，否则便会招致失败。事实上，对话杂语是一种对批判意识的所有形式的哲学反思的一种由因及果，先验的条件。庞齐奥主张作为一项职业，一个机构的哲学应该在倾听的艺术上再生。此处的倾听关注的是语言，生活中话语的哲学。对话杂语、多语制、历史、自然环境中的语言及其组成的内部语言的对话联系为语言确定了方向。在此种意义上，“语言的”（of language）在“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这一表达反映在主格上：作为一个方向，语言最终哲学化为一种语言固有的对话性的多元话语。

对话主义和内在的多语制的能力，多元话语的能力要求作为一门学科的语言哲学和其他一般的语言学学科一样，发展自己的方法论。换言之，庞齐奥的研究中，对话的多元话语作为研究语言的方法，定义语言哲学的标准产生的。因此，庞齐奥认为对话的多语制是哲学反思和科学一种由因及果的，先验的条件，不仅是针对语言的条件，也是所有形式的批判意识的条件。

二、批判的语言学理论，对话主义和阐释

庞齐奥是一个对话主义的理论家，这一概念是庞齐奥阅读巴赫金和皮尔斯的著作时提出的，他认为言语是对话的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参与到他人的言语中。这也是符号的对话性的结果，正如他在符号的对话性质系列课程中提到的那样。2006年，保罗·布伊萨克（Paul Bouissac）委托庞齐奥在符号学研究所网站上开设相关课程，在出版商莱纳德（Leonard Sbrocchi）的鼎力相助下，与莱格斯出版社（Legas）合作的这些内容的著作也得以问世。正如庞齐奥所描述的，对话不是我们所选择的；相反，我们遭受对话的折磨，并受制于它。对话不是以开放心态对待他者的结果，不是对他者让步的结果。相反，对话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接近他者。对话与身体相连。言语是声音，内化的声音。脱离人身的对话是天方夜谈。文字自主性的错觉是个人身体自主性的错觉。对话排除了自我和他者的同质性的所有形式，忽略他们单一性的均等性即综合的所有形式。对话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不可逆转的。语言的动态现实不能从官方语言学的类别范畴上进行理解。相反，官方的语言学是从具体化的特定性的内在的对话主义中抽象出来的，确切而言，是指字词的价值、实用性和意识形态等方面。

庞齐奥指出了对语言和符号研究不足的情况。这些研究只是在平等交流逻辑上分析语言

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而与符号生产过程中的历史社会关系相分离。在众多人文学科即哲学、符号学、语言学、语言哲学、政治经济学、人类学、美学创造和文学中，像巴赫金一样，庞齐奥探索了这些科学互动和冲突的边界和话语的界限。

正如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所证实的和一般符号学所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认为，逻辑、对话、意识形态是指符号生命的三重维度。这三个术语也是研究庞齐奥一本合集的题目，是由笔者编辑的《符号学》上一个的特刊《符号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逻辑和对话》(Ideology, Logic, and Dialogue in Semioethic Perspective) (148-1/4, 2004)。还有之前于 2002 年，在国际符号学研究会的支持下，在巴里大学举办的关于庞齐奥的国际学术研讨会“逻辑、对话、意识形态的功能”。逻辑、对话和世界的符号模塑都包含人类符号功能过量的能力。这种过量能力使得符号不再是必需品，并且打开了欲望、发明创造、非功能性规划之门。鉴于此，人类是自身的最终目的，并崇尚人类不甘沦为手段或工具的价值。

庞齐奥已写了大量文章来解决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辩证法和符号学间的关系。其中一些文章可在 2004 年出版的《符号学与辩证法》(Semiotica e dialettica) 中读到。从这个角度来看，庞齐奥一个主要的编辑工作是将彼得·希思帕尼斯 (Petrus Hispanus) 所著的经典之作——《符号逻辑学》(Summule logicales) 由拉丁文翻译为意大利语，并于 2003 年出版了双语评述版 (修订版，2010)。

《符号学与辩证法》对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间的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各章节中包含以下观点：1. 符号学与辩证法；2. 关于非语言符号的逻辑矛盾；3. 马克思关于矛盾的观点；4. 唯心主义，控制论与唯物主义的辩证法；5. 数学、辩证法与社会政治经济学。卡尔·马克思 (Karl Marx) 的数学手稿；6. 辩证法与真理；7. 知识与辩证唯物主义理论；8. 量子物理学语言与生产关系；9. 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10. 对话与辩证法；11. 对话理性的批判；12. 自动性的解放；13. 逻辑与辩证法。彼得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或《符号逻辑学》。

正如庞齐奥在引言(pp. 7-7)中解释的，“辩证法”(Dialectics) 是一个由来已久涉及不同的学科领域的哲学概念，像逻辑、认识论、语言学科、数学、物理、生物、政治经济学以及其他社会学科。辩证法的概念在这些领域内被探讨。另外，这些领域在辩证法上相互关联。辩证法与费鲁齐奥·罗西-兰迪所提的“去总体化的方法”(detotalizing method) 相关，这一方法是对“以部分代整体”(pars pro toto) 谬论的批判，是对以部分换整体的错误的批判，对把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整体看作是互相孤立，自给自足的部分的批判 (Rossi-Landi 1968)。罗西-兰迪也称这个方法为辩证的，并将其应用到符号学研究中。在他未出版的，计划收集其整个研究过程的一系列论文的著作中，其中一本的书名为《辩证法的分析》(Dall'analisi alla dialettica)。

符号和符号学的一般科学被包含在独立于话语概念本身的辩证法，独立于辩证法是否被看作是话语的直接对象的辩证法。仅是因为符号学的范围涵盖不同的，上述所有的学科领域。随着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global semiotics) 观点的提出，符号学的研究视野自皮尔斯和莫里斯后，变得更加开阔，由此进一步证明所有基于“以部分代整体”(pars pro toto) 谬误上的一般符号学的方法的局限性 (Sebeok 1991, 2001, 2003; Ponzio and Petrilli 2002a, b)。但符号学的辩证特点不仅关注学科和其研究对象的相互作用，这些研究对象都联系在交织于生物圈或统治地球的整个生态系统中的符号学网络。辩证法也关注形成符号本身的各种联系，根据皮尔斯、莫里斯和西比奥克界定的符号学传统中所描述的那样：符号存在于对象-符号-解释项的三元关系中，这种关系组成了由在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无限循环的延期中，存活于与同类的其他细胞的关系中的一种细胞。

皮尔斯描述了对话的符号和解释项的关系。事实上，关系的另一方面在某物作为符号的过程或情境，即符号活动的对话性上，是显而易见的。“辩证法”(dialectics) 一词来源于“对话”(dialogue)，同时，虽然在思想史上，辩证法就以不同的含义被使用，但自柏拉图 (Plato)

时代始辩证法就与对话紧密联系以来。

西班牙的彼得（*Petrus Hispanus*）（1205c-1277）认为辩证法为所有方法的原则开辟了前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研究和实践的各个学科中，辩证法必须居于首位（*Tractatus. Summule logicales I, 1*）。彼得开始在他的《逻辑哲学论》中显示了“辩证法”（*dialectics*）一词由“对话”（*dialogue*）起源的过程。

巴赫金关于对话和他性的哲学在“真正社会主义”（*Real Socialism*）的社会思潮中幸存下来。自 20 世纪 60 年代的中后期以来，最终在全球获得了认可（参见 *Bachtin e il suo Circolo* 2014; *Ponzio* 1980, 2015）。在他们的语言和非语词的符号研究中，除了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拉伯雷的专著外，巴赫金和同派研究者也为符号学和辩证法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点（参见 *Bachtin e il suo Circolo* 2014; *Bakhtin* 1963, 1968; *Medvedev* 1928; *Volosinov* 1928, 1929）。巴赫金描述了他称之为的虚假辩证法，其中，综合体的产生甚至先于论题及其反题的详尽阐述。因此，论题和对反题是一开始就由综合体确定，作为生硬化对话的结果，这就导致了独白式话语。必然以对话结束的辩证法的问题在巴赫金的反省中出现。辩证理性的批判是一种对话理性的批判（*Ponzio* 2003）。

一般而言，对符号学和辩证法关系的反思有必要考虑运用于马克思和恩格斯（*Engels*）创立的马克思主义领域的辩证法概念。对符号的反思能让辩证法的概念免于在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犯下解释错误。对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亚当·沙夫（*Adam Schaff*）作品的误解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但此处指的其关于语义、逻辑、知识理论和马克思的人本主义之间的关系著作。正如在辩证矛盾和非矛盾原则的并置一样，沙夫为在这个领域中最常见的误解所做的批判，为其奠定基础（参见 *Ponzio* 2004: 7-9）。

庞齐奥关于意识形态的研究计划始于他 1970 年的作品（扩展版 2005），《语言与社会关系》（*Linguaggio and relazioni sociali*）。在他 1973 年的专著《语言与社会意识形态的生产》（*Produzione linguistica and ideologia sociale*）中，（1992 年发行法文评论版和扩充版，接着 2012 年在巴西出版），他很快对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的语言分析方法采取了批判的态度。该研究的一些方面随后在 1991 年的《语言哲学 2》（*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2*）一书中得到发展。由于乔姆斯基在世界学术界的广泛影响，1973 年庞齐奥的批判态度是语言学领域的主导趋势。庞齐奥的主要主张是乔姆斯基误把一种特定语言即英语的运用认为在一般语言上是必要普遍的（庞齐奥声称他的例句通常无法翻译成其他语言）。此外，根据庞齐奥的观点，乔姆斯基混淆了分析的不同层次，把被分析对象的描述层次误认为是分析模型的构建层次。庞齐奥的批判态度符合塞巴斯蒂安（*Sebastian K. Shaumjan*）的研究和他二阶段的生成语法理论，其中关于遗传型和显性两个层次上表述得相当准确，而与他所描述的乔姆斯基单阶段的语言理论形成对比。但在乔姆斯基的作品中，最令人奇怪的是他从不提出问题：为什么形成多种语言？为什么会出现巴别塔？如果原因是存在的话，正如他坚持认为的那样，所有语言中存在一种与生俱来的普遍语法。

在庞齐奥看来，乔姆斯基所说的“语言创造力”（*linguistic creativity*）实际上指的是一种特征为规则的应用、规范、不受说话人控制的程序的情境。这样的情境不仅涉及语言的语音、句法和语义层面，也包括意识形态层面。作为语言学家的乔姆斯基很少分析意识形态问题。相反，作为美国政治批判家的乔姆斯基以一种完全脱离于语言学专业性方式解决了意识形态的问题。庞齐奥说，这两个乔姆斯基从不说话。

随着对“语言能力”（*competence*）和“语言表现”（*performance*）的分类，像是康德、胡塞尔、皮尔斯、梅洛-庞蒂这些作家从未存在过一样，乔姆斯基再次从术语和其机制的反面这一传统问题，即意识和经验的对立、行为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身体和心理的对立、内部和外部的对立、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对立。在其早期 1961 年的专著《意义，沟通和共同交谈》（*Significato, comunicazione and parlare comune*）中，乔姆斯基参考了康德、罗西-

兰迪的观点，制定了“一般演讲的方法”（methodics of common speech），在 1968 年的专著《作为工作和贸易的语言》（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英语版，1983），将其发展为“语言工作的方法论”（methodics of linguistic work），随后演变为术语“一般符号活动的方法论”（methodics of common semiosis）。庞齐奥对乔姆斯基批判的中心范畴是由罗西-兰迪 1968 年的专著发展而来的“语言工作”（linguistic work）。罗西-兰迪联系不同的人文学科，政治经济和语言学，提出了“语言工作”的概念，要专门确立符号生产和人造品生产的类似关系。庞齐奥延续罗西-兰迪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并开始关注主体和社会，自然环境间的辩证关系，关注语言生产过程的结果中，作为工作的语言和作为工作产物的不同种语言。

为达到功能性的目的，一个语言学理论必须摆脱描述性的、分类型的语言分析方法的限制，要能阐明问题，并且是至关重要的。还需要解释与意识形态的批判理论相关的语言生产的社会过程。通过运用巴赫金，沃洛希诺夫（Voloshinov），马克思，沙夫，罗西-兰迪的分类，其中包括“作为工作的语言”（language as work）和“作为历史、社会和意识形态现实的语言”（language as historico-socio-ideological reality），庞齐奥批评了将“语言使用”（linguistic use）化约为“行为”（behavior）或“活动”（activity）的倾向，证实了人类对语言和语言环境上创造性的（诱导性的）、批判性的干预潜能。

特别是关于罗西-兰迪的作品，庞齐奥讨论“语言工作”（linguistic work）、“语言价值”（linguistic value）、“语言市场”（linguistic market）、“语言资本”（linguistic capital）等概念。罗西-兰迪建立了物质生产与语言生产、语言学和经济学间的联系（“语言学和经济学”是他 1975 年开创性专著的书名），从而得出了“语言工作”（linguistic work）的概念。当时，他的这一观点看起来是奇谈怪论，或至少可以说仅仅是比喻性质。罗西-兰迪所指的“语言工作”（linguistic work）就是现代意义上的“非物质工作”（immaterial work），它是一个有效的资源和利益来源。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当时，“非物质性资源”（immaterial resources）在生产过程中的作用不像今天那样明显，因此符号、语言和交流的作用也不如现在显著，罗西-兰迪证明了“语言生产”（linguistic production）和“物质生产”（material production）间的同构关系。由于科学研究的进展，特别应用于电子设备的人工智能的进步，物质生产和语言生产在经过长期以来被错误地相互分离后，直至近期才以“体力劳动”（manual work）和“脑力劳动”（intellectual work）的形式被证明是统一的。关于罗西-兰迪的研究，庞齐奥不仅发表大量论文，还著有两本完整的专著：1988 年的《罗西-兰迪与语言哲学》（Ferruccio Rossi-Landi and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2008 年的《重读罗西-兰迪，语言工作和全球市场》（Linguaggio, lavoro and mercato globale. Rileggendo Rossi-Landi）。

在 2003 年的专著《语言和语言》（Il linguaggio and le lingue）和 2004 年的《普通语言学、文学写作与翻译》（Linguistica generale, scrittura letteraria and traduzione）中，庞齐奥大致回归到语言能力和知识的发展问题上，即乔姆斯基在 1985 年所归结的“柏拉图的问题”（Plato's problem）。“柏拉图的问题”这一表达是指一定数量的有限元素如何产生在数量和质量上无限的知识。意识形态的问题不仅严格地与语言理论相联系，也同逻辑和知识理论密不可分。根据庞齐奥的描述，与乔姆斯基经验和能力的二元论截然相反，继康德之后，现代概念的经验被描述为包括诱导型推理过程的解释性操作（Charles S. Peirce）。通过这样的操作，主体经常会使得大体上呈现分散离乱、零碎部分状态的数据日渐完善，组织有序并且互相联系。与终端输入的局限性相比，被视为解释的经验是富有创新的，更有意义的。因此，语言经历与语言能力融合，语言能力不再需要天生的补充物，即一种婴儿与生俱来的自然的设备。

在语言习得和推论性-诱导性语言运用的联系的基础上，其中，诱导和无尽的语言学习的关系是相互支持的一种：语言学习运用于诱导的过程中，而诱导的过程反过来通过语言学习得以加强。事实上，推论过程必然是建立在先辈们解释性的语言工作的基础上。他们也流传下这些语言材料和形成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语言的工具。

而对于超越二元对立的语言能力和经验，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二元论的语言学理论，庞齐奥借鉴了皮尔斯及其符号学理论。通过对乔姆斯基深层结构概念的批判，庞齐奥提出“解释语言学理论”（*interpretive linguistic theory*）。从这个角度看，不同层次的理论，前件、派生、深层结构和表面结构这一系列的理论都不再适用。就与对它进行解释的另一句话（作为皮尔斯所说的解释项）的关系而言，相对于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的“解释语言学理论”（*interpretive linguistic theory*）可以解释为理解一句话或一般语言符号的能力。所有的话语都以其解释项为特征，由其解释项生产、识别和发展而来。根据这种方法，话语的解释项并非是一个深层结构，而是一个语言符号。确认话语或任何一个语言符号的解释项只有实现了它表达和解释的条件才是被表达的。

关于解释项，要区分“识别解释项”（*identification interpretant*）与“应答性理解的解释项”（*responsive understanding interpretant*）。前者的功能在于在语音或图形构造、语义内容、形态句法结构上的层次上识别出符号，后者则集中在符号的实用性上。“解释项符号”（*interpretant signs*）和“被解释符号”（*interpreted signs*）关系的特征是对话主义，积极参与和他性，这些术语也是庞齐奥研究方法中特别重要的一方面。这种符号解释的层次与话语的意识形态水平密切相关。这些问题都在庞齐奥 1990 年《作为符号的人》（*Man as a Sign*）和 1993 年《符号、对话和意识形态》（*Signs, Dialogue and Ideology*）的著作中得以明确阐述。

随着 20 世纪 70 年代初在意大利开始的从所谓的解码符号学到解释符号学的转变，庞齐奥在相关方面的研究也延续这一变化（cf. his pioneer book *La semiotica in Italia*, 1976）。由“解释符号学”（*interpretation semiotics*）所提出的符号模型是不同文本所得出的相关对话结论即理论知识（*Peirce*）、文学理论（*Bakhtin*）、价值论（*Morris*）的异质品。关于这些结论，庞齐奥对符号学和意识形态（*Rossi-Landi, Schaff*）关系的研究引起了学者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对于符号和社会价值关系的瞩目。查尔斯·莫里斯已在研究这种关系上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 1964 年出版的《意谓与意义》（*Signification and Significance*）一书中提出了符号与价值的关系理论。与认知符号学、描述符号学和意识形态上中立的符号学的观点相反，当下符号学的主要趋势旨在为人类及人类符号的全球侦察恢复符号活动的分类系统。

基于解释符号学基础上的皮尔斯和莫里斯的符号模式，是一动态模式，它根植于无限的符号过程或从一个解释项符号到另一个的开放的演绎链的概念中。成立的逻辑不是平等交流逻辑，而是在形成符号网络的解释项的关系中无沟通、过量和他性的逻辑。在具有自己的符号物质性的被解释符号上，解释项符号会表达出更多意义。由于其符号的物质性，被解释符号将抵制任何一种单一的解释，或庞齐奥所称的“解释路径”（*interpretive route*）。换言之，被解释符号的意义不会由任意单一的解释项符号或者解释路径详尽分析。在解释符号学的框架下，符号往往是符号情境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中，符号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符号工具（能指）、意义（所指）、指称物、解释者、解释项和规范符号系统的编码——被认为是复杂链接的符号活动过程中互不相同，紧密相关的各个方面。

逻辑推理，符号活动的对话维度和意识形态的批判必然要求一个符号说明的分析，要求充分的分析必须从认识到这种现象的符号特征开始。符号的不同功能应该得到分析。然而，对符号的描述若局限于功能将不足以解释推理过程和对话，意识形态中的创新、创意和创造，即符号生命可预见非功能的宽广余地。

三、对“三分式”、“辩证法”和“自动性”的重新阐释

与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费利克斯·伽塔里（*Felix Guattari*）（1976）提出的根茎图式相对比，尽管他们对二分逻辑的批判仍然是一分为二的，庞齐奥提出了三分的自动性，“第三性”（*Peirce*）的自动性，对他者开放的自动性，关爱的自动性，创意性诱导的自动性。在这些问题上特别有趣之处在于庞齐奥 1989 年的专著《哲学家和乌龟》（*Il filosofo e la*

tartaruga), 以下将呈现其中的一些方面。

精神分析、结构语言学(包括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理论)、以语言学为模型的人文学科(结构人类学等)、数学信息理论都倾向于遵循二元逻辑,也就是说,一对一关系的封闭逻辑。二元逻辑不仅规定主导的意识形态,因此也规定着服从于意识形态的社会现实。主导的意识形态被描述为术语“自动机”,这种“自动机”具有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旨在规范和再生产其他依赖于前者并对其加以支持的自动性。

社会变革的条件是要实现扩展,开放的整体性,而这一整体性实现的条件是根据对话主义和他性的逻辑,包括形成现在再生产循环的封闭的整体性在内,由一对一关系组成的整体需要被去总体化。

今天,符号学的范围超越了索绪尔式(Saussurean)/叶尔姆斯列夫式(Hjelmslevian)/格雷马斯式(Greimasian)的研究方法和皮尔斯做法的对立,一对被认为是分别汇聚二元论和三元论的对立关系。但是,据庞齐奥观察,中心问题并非是在二元论和三元论之间进行二选一,而是在一元论和多元论间的选择(Ponzio and Petrilli 2002a: 263-4; Ponzio 2007: 34-5)。换句话说,索绪尔矩阵的符号学提出的符号模型的局限不是由二元论决定的,而是由二元论在能指和所指平等交流逻辑的概念中,在复杂的符号生命降低为编码和消息所形成的二分法范式中找到依据这一事实决定的。

这一重要的对立关系存在于一个符号模型之间。对于一个复杂的符号活动过程而言,如皮尔斯提出的那样,这一符号模型往往过于简化。根据该模型,某个事物就成了一个符号,并且模型对这个符号过程的不同方面都是有所裨益的。后者的有效性不是由一个空泛的三元的形式得出的,而是取决于构成皮尔斯的三元论的特定的内容,也就是形成三元论的各个类别,他的符号类型,还取决于他的符号模型的动态特性。这个模型指出符号基于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循环。这些类别包括“第一性”(firstness),“第二性”(secondness)和“第三性”(thirdness),三个一组为“再现体”(representamen),“解释项”(interpretant)和“对象”(object),“归约性”(symbolicity),“指示性”(indexicality)和“像似性”(iconicity)。所有这些因素支持了符号活动的一种理解,在这一活动过程中,他性和对话主义是决定性的。

与皮尔斯和巴赫金对符号的理解相一致,庞齐奥还将符号和意指过程置于对话关系的背景中。作为一个符号网络中解释路径的一部分,意义是明确界定的,并与其他解释路径的对话相联,易于发生持续的变化和扩展。意义的这种原始的主题化有助于更好地理解这些概念,如意指的不稳定性、多声、内部多语制、对话主义、符号的物质性、表意他性和符号的自足性,这种符号甚至拒绝生产它的主体的解释意愿(Petrilli 2010: 137-58)。这种对话关系在多种层次上得以发展,包括符号与解释项的关系,在论证中前提与结论的关系,形成一个单一解释路径的语言与非语言解释项的关系,或形成不同解释路径的解释项的关系。

被称为“解释符号学”(interpretation semiotics)的皮尔斯与莫里斯的符号模式是在一个动态的符号过程,它基于无限符号活动的逻辑和一个解释项到另一个解释项的无限循环上。与基于平等交流逻辑的符号模型相反,该模型是由在形成符号网络的解释项的关系中的无交流,过量和他性的逻辑所决定。解释项在被解释物上表意丰富,被解释物反之则具有符号的持续性,这种持续性能抵制任何一个“解释路径”,一种单一的解释,并永远不会在这一解释或路径中得到详尽讨论和分析。(Ponzio 1990: 17-32)。在解释符号学的框架下,符号往往是符号情境中的一部分。在这种情境中,符号活动的各个组成部分——符号工具(能指)、意义(所指)、指称物、解释者、解释项和规范符号系统的编码——被认为是复杂,链接的符号过程中紧密相关的各个方面。

皮尔斯的逻辑是对话性的、多元的,尽管其优点不在于三分式本身。黑格尔的辩证法从符号生命的组合式对话主义中抽象出三段论,从而产生了非直线型的,独白式的辩证法。巴赫金在其1970-1971年的笔记中分析了黑格尔独白式辩证法的形成过程,显示了它从对话式

符号活动的真实文本中起源的过程。这一过程在于从对话中去除声音（声音的分离），消除了任何个人或情感的语调，从而将现场的语言和对话关系抽象为概念和判断，因此单一的抽象的意识形式形成了辩证法。皮尔斯本人表明立场，反对黑格尔分析的系统框架，以及将辩证法理解为一种对结论忧心忡忡的搜寻，并认为辩证法朝着综合的单向而不是开放、矛盾的方向发展（on the relation between dialogue and dialectic in Peirce and Bakhtin, see Ponzio 1986, 2006）。

在解释符号学的框架下，特别参考了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精神分析和皮尔斯符号学的相关研究后，庞齐奥分析了解释和构建过程的记忆。特别是，他专注于连续性的问题，以及连续性和记忆之间的关系。他与皮尔斯一样，开始关注知觉的意指物质性，它“不能随意被去除，甚至也不能从记忆中抹去”（CP 4.541）。尽管如此，一旦并永远被固定和定义后的实体本身并不能使知觉的抵制成为一个事实，因为知觉是一个符号，是一个解释项的解释，反过来又成了一个符号，接着又成为另一个解释项的解释。在知觉和记忆中，赋予本身的就是赋予自身一个解释，而非对一个主体的解释，相反，主体是由外部的解释过程所赋予的，而是对一个符号本身，嵌于解释和解释项链的主体的解释。记忆可以被理解为连续的解释和解释项的关系链，这种关系构成了一个开放的主体的叙事，即对不同的解释路径进行接连不断的再阐释的开放性。

认识到在解释项和解释之间保持距离的需要，与一个局外人（这里指的是精神分析家）相联得出的对话的外位化关系的需要，是基于在分析实践中的解释。通过将重构的“事实”（facts）和“失忆”（loss of memory）转变为符号，即解释与解释项的关系，皮尔斯的符号学使解释摆脱了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仍可追溯到实证主义的残余。从这个角度看，解构与建构的分析工作不能与对话的解释和解释项的关系分离，而这对关系是由两个尽可能异质且无关的符号扮演的，发生在阻碍彼此互利的他性抵消的不对称的关系中，而不是发生由解释和解释项的平等交流逻辑规定的关系中。

在《建构分析》（Konstruktionen in der Analyse）中，弗洛伊德在意义延伸上区分了“解释”（interpretation）和“建构”（construction）：解释是指单个元素如突发奇想，或一个失误或不恰当的运用；而建构则是详细分析一整片被分析者所遗忘的故事。但是，就重建而言，弗洛伊德提出了建构的概念，同考古学家和语文学家的工作相似。但根据庞齐奥所言，分析的构建不应在恢复的意义上提出，不是返回到无论是一个建筑物或一个文本的之前的状况上。相反，构建意味着建立对话的他性关系是解释的条件。在解释中，解释与解释项的关系不会自我呈现在复制、意译、实译上，而会出现在批判性阅读，创新的阐述和回应性的理解中（Ponzio 1990: 48-50）。

思维符号关系被不断分解为解释的解释符号对象与解释性符号或解释先前符号的解释项的关系。这种关系对他者，外部世界抑或是不会降级为与先前经验的逻辑关系的推理过程都是开放的。在这种情况下，在构成自我身份的他性与自我之外他者的他性的双重意义中，记忆与他性互相联系。换句话说，他者不仅是在生物和传记上自我之外的他者，区别于自我的他者，也是构成身份的他者，其他人，自我中的他者。因此记忆不仅是重新构建已生成的文本的问题，不仅是已体验过的经历的问题，也是创作、构成新文本、进行全新体验的问题。分析的解释可能要归功于他性关系的构建，他性关系阻断了意义的单一性，解构了自我的契约身份。从这个角度来看，他性关系对克里斯蒂娃（1983）所理解的“激情符号”是开放的。

对于主体性与其符号问题的一个关键且辩证的方法，证明了为了身份和在他性和外位性上恢复意义的目标而不惜牺牲他性。继巴赫金之后，庞齐奥将“去总体化方法”（detotalizing method）理论化，规避身份的限制，虚假但具体的总体中的零零碎碎（例如本体论、政治、平等交流、个人、社会、国家、民族、西方世界、欧洲、东方、语言、真理、知识、平等、正义、自由、有限责任、需求）。他批判了总体性的封闭性，将去总体的情况理论化，即在

完整的、去总体化的符号网络中，存在着在对话层面上相互作用的，彼此连接的更小个体。当今社会再生产体系由身份的逻辑所规定，这意味着它是建立在种族隔离，甚至是他者消亡的基础上。这一体系是基于具体的抽象物，包括“个人”（Individual）为了身份被迫牺牲他性这一具体的抽象物。对该体系批判的前提是他性的观点，绝对他性，二元对立逻辑的一对一关系中不仅存在着的相对他性。身份批判的前提是对他者的认可，也就是对他者不能被忽略或消除这一事实的认可。

“外在性”（outsideness），“外位化”（extralocalization），“外位性”（exotopy）（见 Bakhtin），绝对他性（见 Levinas），“不及物性”（intransitivity）（见 Barthes）的情况，最好地描述了确然的人从封闭的身份限制中解脱出来。这种情况在文学话语里是显而易见的外位化、距离、他性的程度构成了文学价值的程度，并成为不同文学体裁的特征。这并不意味着赞同“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这一理论，列维纳斯将这一理论描述为虚假的和道德的。因为它把艺术置于现实之外，并使得艺术家们免于承担全部的责任。绝对他性的自由包括绝对责任、无阻碍回应的状况，和无托词的责任。

在 1919 年的早期论文《艺术和责任》（Art and Answerability）中，巴赫金就坚决主张艺术与生活、艺术与他性、艺术和契约或官方角色中无限责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关关系（Bakhtin 1990: 1-3）。在这一框架下，主体被理解为复数、零散、对话性、绝对差异性和无限责任，同先建的独白式的意义一样，它与传统哲学的整体主体相对立，与在连贯的单一的意义的概念相对立。与单一观点、权威声音、契约文字的稳定性、身份的保证、静态系统和规范的盲目责任相反，庞齐奥也描述了确然的人对他者的责任、对话主义、倾听和他性等方面的能力。主体涉及在开放空间的“大时代”（great time）（Bakhtin）中的他者。自由不能回避与他者的关系，面对他者时的脆弱性，对他者的责任。确然的人应毫无借口地对他者承担起责任（参见 Levinas 1972: 98）。

关于主体性的自动性的比喻主要是基于机械的消极意义上的考虑。它显然赞同矛盾的概念，如一方面是必然性和自发性，另一方面是关于外部约束的偶然性和自主权。庞齐奥在辩证法的术语中展开对这类矛盾的论述，并提出了似乎是另一悖论的观点：自动性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一过程，人的行动变得自主。因为它结合了编程的、自发的、必然性和偶然性，自然和人造等诸多因素，自动性是人的主体性的特点而非机器的特性。作为自主决定的自动性不受外部条件的影响。自动性通往无意识：轻率，健忘和口误的自动性，梦想，欲望和激情的自动性。

看似分离的自动性事实上是辩证地彼此相关的。我们把一般用来分析人及人的行为的较大的类别进行分解或“去总体化”（detotalize）时，这种相关性则更加明显。这些大类别包括个人主体、社会、文化、阶级、语言和言语。仔细观察后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类别建立在一系列的在不断变化的关系体系中的自动机之上，因此从特定角度看，看似有序的自动机实际上是从他人或他物那里产生的自我驱动和自发性（Barthes 1978; Rossi-Landi 1972）。庞齐奥探究了构建开放的、能对外部刺激进行反应，反应后并能进行修改和重组并能区分拟态自动机和总体的异质性的自动机的可能性。他把人类自动性这一有建设性意义的解释与葛兰西（Antonio Gramsci）和他的正面阐释联系起来。葛兰西分析了自由和自动性的关系，声称自动性不容于专制，而不会与自由发生冲突。自动性是一个团体的自由，与个人主义的专断意志相矛盾。如果这种专制被广义化，它便不再是专制，而是向“自动性”（automatism）方向的转变，变为一种新的理性。自动性是剥去任何投机性的光环外衣后的理性（Gramsci 1932-1933）。

把自动机视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独立的实体这一方法的局限性在皮尔斯的三分法（偶然性）的三元类别，关爱（在他者的关系中的爱）和与其解释理论和最负盛名的符号三元，指示符号、像似符号、规约符号相关的必要性上清晰地显现出来。事实上，自动机是面向较大

自动的实体的关系，面向其未控制的机制和程序。作为符号的现实情况，调节自动性的解释实践不仅由必然性（指示符号）、偶尔性（规约符号）、解释重复和预测的演绎和归纳的推理实践所调控，同样也要受随意联系的自动性、相似性和类比性（像似符号），解释意指过程中创意和不可预测性的诱导型的推理的调控。

四、文学写作与语言、交流和社会项目的批判

庞齐奥的许多著作致力于文学创作，最终通过文学的角度来更好地理解语言。庞齐奥把文学观主题化为一般方法论的原则。文学写作不仅被主题化为运用符号科学中的模型和类别的研究对象，而且它也为这些模型和类别的详细阐述提供了方向。表述中“文学的”（Of literature），“文学的角度”（the point of view of literature）不仅意味着把特有的模式和类别运用于文学文本的研究，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它是指向“过量”（excess）、“他性”（otherness）、“对话主义”（dialogism）、“间接语”（indirect word）、“题外话”（digression）这些现象，作为符号分析的一般类别，这些现象是文学语言的特征。正如列维纳斯和巴赫金所说的那样，文学写作是为全面实现“外位化”（extralocalization）所立的优秀标杆，以“绝对差异性”（absolute otherness）和“对话主义”（dialogism）的逻辑为导向，而非独白式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身份。时间和空间不属于生产积累的顺序，而要诉诸于离散、题外话、耗费和对话杂语中。

以其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研究为代表，例如专著《哲学界与乌龟》，庞齐奥再次阐述了“他性”（otherness）、“间断性”（discontinuity）、“自由裁定”（discretion）、“激情”（passion）、“耗费”（expenditure）、“浪费”（waste）、“超科学”（transcience）、“漂移”（drift）、“转变”（shift）、“间歇”（ephemera）这些概念，所有这些概念都用于揭示脱离平等交流逻辑的一场运动。“伟大艺术作品的永恒”（Eternity of great artworks）与“激情的微不足道”（vanity of the passions）的差异正是他质疑的。激情的渺小，即过量逻辑使得艺术变得伟大；所有的叙事，所有以激情为特征的漂移运动中的项目均属于艺术的领域；叙事性的伦理在激情的微不足道中得以实现。在这个意义上，叙事性的伦理是激情的伦理。如果艺术品，项目就是内容和行动意义；如果激情是形式，那么伟大艺术作品的渺小便能证明他性，计算的过量和耗费意义上的经济消费的道德。正如作为理性哲学家和强烈情感的专家的康德所声称的那样，不同于即兴、不加思考的情感，激情为实现其目标需要时间和反省。

艺术品证明了能指对平等交流逻辑的抵抗力，这是基于浅薄的个人利益上的身份逻辑。人类学家告诉我们，社会不会只存在于生存层面上：社会再生产总会包含过量的逻辑。列维纳斯在艺术作品的意义上，指出了“作品”（oeuvre）这种现象（巴赫金在这个问题上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差异性的基础上才会实现艺术价值，并超越身份、时代和整体的限制而面向他者。外位化、外在性、外位性、过量逻辑是实现艺术价值的条件。

在这个方面，“热情”（passion）这一词指的是过量逻辑；因此庞齐奥将其引入到批判的平等交流逻辑，资产阶级经济、积累逻辑、功能、效率和生产力。受激情影响的主体是一个被动的主体。这一主体被那些观点理解为是消极的，与此相反，那些观点赞扬权威，自主性、活动、意识这些价值观。但确实的人类主体，“主体”（subjectum）的组成是被动的，它遵从“服从于...、依赖于...、对...感兴趣、朝向...”的模式。换句话说，像我们所描述的被动主体，其特征是面向他人，倾听他人和理解他人的能力。从这个角度来看，超越被负面地理解为无法控制自己，对自己负责，不论在此意义上的任何意图实现自我目标这一主体的“被动主体”（passive subject），存在着另一种“服从于...”（subject to...）的模式。在这种情况下，被动主体不是由意图、意志力，规划能力和控制力来衡量的，相反，它意味着面向他者的机会和可能性，他性和对话主义的能力，过量和倾听。因此，这一意义上的被动性与社会和语言异化的状况无关，与被动服从于外部限制和持无条件接受态度的绝对主体无关。与此相反，根

据这一描述，被动性指的是超越封闭身份和个人利益限制的能力；它与概念化为一个可无限查询，有创造力批判力的总体的主体相联系。

顺着这个方向发展话语，庞齐奥介绍了“间歇性”（ephemeron）这一概念，以表示与曾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占主导的生产力逻辑相对立的确然人的模态。维多利亚·韦尔比（Victoria Welby）将一个与主体性分析中的他者的关系中形成的开放的主体理论化，相对于“标识”（Ident）这一概念，她还引入了自我的“间歇性”这一表达。如我们所描述的，间歇性无法解释和控制积累和消费逻辑，生产和功能逻辑，因此可暗指非异化的自我。间歇性可解释创造力、差异性、自由、确然的人。

间歇性暗指主体性的绝对他性，亦即对社会项目和主导的思想不起作用的权利；在固定的角色、协议、程序的身份下，在与话语顺序相关的承诺下，和官方秩序下，可以成为他者的权利；间歇是有时间患病、衰老、死亡的权利，有时间建立友情和爱情的权利。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以及资产阶级制度价值观的背景下，间歇代表过量和损失；就历史、积累、教化的时间而言，它是必不可少的不连续性、碎片、题外话，在数学意义上的离散的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看，分散是随着共同经历，时间对抗时间一段时期，一段历史的时期。分散的，间断的时间是独立和他性的时间：我自己的时间，不同于你的时间，因此不能以你的时间累积，不可或缺的间断的时间。这种分散是一个间断、一个断裂，是他性和对官方公共秩序抵抗的载体。分散也可以在自由裁断的意义上被理解为储备、保密性、私密性。间歇也是分散时间的载体，他人理解的我的时间、他性时间、大相径庭的时间的载体。间歇表示其他人的他性和差异性的状况。

与语言学科的方法一起，庞齐奥提出旨在让科学、教育和社会文化价值遵从于市场等价交换的逻辑和利益的社会项目的批判。当今消费者社会是由生产交换消费周期的狂热节奏调控。而矛盾的是，生产环节持续进行的条件是不连续地、过量地、间歇地生产，庞齐奥将其描述为“驯化”（addomesticated）间歇的状态。与之相反，为克服异化和维护确然的人的正常生活，创造力，差异性，自由，非异化的自我，不同类型的“间歇”（ephemera）对于基于累积和平等交流逻辑的状态是必不可少的。真正的间歇能够扰乱那种逻辑并难以驾驭这样的逻辑。这样看来，间歇表示有节奏的经济的主体，欲望，紊乱，最终走向死亡的使命，所有这些都抵制由特定社会秩序建立的生产力逻辑，效率和功能。

“间歇”这一概念与他性相联系，与在由身份和自身利益逻辑规定的角色和协议中，在话语秩序中可以成为他者的权利相联系。间歇代表在由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价值观统治的社会再生产体系中的过量和损失；就历史，累积，教化的时期而言，间歇是不可或缺的不连续的，分散的，题外的，自行决定的状况。

与他身份的批判一脉相承，庞齐奥强调，忽视符号活动过程的非功能性方面，就等同于忽视符号的他性。功能性的符号活动是身份的符号活动过程。对身份有作用的，在不同于其他，立足差异，将符号降为信号状态的符号意义上差异的符号的活动过程。但符号活动也指在他性逻辑控制的延展和回归上的差异。他性和非功能性的逻辑是符号的一部分，使得符号活动免于被降为基于经济意义上的回报和收益逻辑的双向过程。相反的是，符号活动是一个对他者不可逆转的过程；符号和符号活动的任务是他性。因此，受规定的符号活动超越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平等交流的逻辑，并在过量逻辑上无对照物，无回报的消耗上表达出特定的符号性。如此描述的符号性不能被化约为由信号控制的符号过程的状态。否则，符号解释将不仅仅涉及解码和认同的过程。与此相反，识别非功能性能力的符号特殊性和他性意味着将符号置于从一个符号解释项到另一个无限延展的符号链上。这样开放的逻辑，确切地说是直径逻辑认为符号和符号关系是由创意逻辑，或具体而言，是为回应理解的直径逻辑确定了方向。

当今全球化世界的通讯是通讯生产，是对控制社会再生产的意识形态反应后而进行的交

流。全球化时代的通讯不仅是扩展到整个地球的世界通讯，而且它还容纳了世界，呈现为世界上无可厚非的一个功能。在此背景下，“世界”被理解为时空的自体，个人和集体的身份，存在物，接受极端战争观点的政治的现实主义。

与庞齐奥对身份逻辑的批判和沿袭列维纳斯和他的现象学的分析一致，他把根植于西方文化的各种联系进行主题化，即世界、叙事、历史、时间、身份、主体、自由、工作、目的性的捐赠意义、个性、差异-相同、利益、福利、本体论、真理、力量、理性、权力、商品工作、生产效率、政治和战争的各种联系。此种联系一直被资本主义利用并被其扰乱，时常发生冲突，甚至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程度更甚。为一己之私利用他人的世界，为捍卫身份的权利和自我利益，为了身份不惜牺牲异他性的世界，甚至认同战争合理性的政治有利于保障人类存在及身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和平不过是片刻的安宁，稍作缓歇是为了更好地整装再战，就像在夜晚和空闲时间，休息有助于更好地回归工作，更好地为日常必需品打拚奋斗，对这样的世界，庞齐奥探究了建立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但都有着相同的物质和世俗秩序的各种关系的可能性。

对确然的人的追踪在本体的时空之外。它属于人际关系不能被化约为身份的范畴，弱化为预定义的主体和对象间的关系，或贬为交换、平等、功能、效率、自我利益间关系的一个维度。庞齐奥在超越存在和列维纳斯称之为“存在之外”（*otherwise than being*）的维度上探索回应的可能性。与“别样的存在”（*being otherwise*）相反，“存在以外”（*otherwise than being*）这一表达指的是本体论和世界本身的外部。与世界意义不同的意义维度上，这是一个对世界的世俗超越的问题。与同一性的人文主义不同，在他性逻辑，异他性的和存在之外的人文主义的基础上，人文主义的另一种形式是可能存在的。

庞齐奥把列维纳斯发展的“存在之外”（*otherwise than being*）的概念与巴赫金的对话概念联系起来。对话不应被理解为形式上的对话，即不同交谈者在一个地方相遇后进行观点的交流。也不该被理解为在统一体中可代替的辩证的矛盾。相反，此处的对话应理解为对他性的解释，形体间的存在，与他者的参与合作，是指单一差异关系而非是同一的关系。庞齐奥形成了他对当今全球化的通讯生产系统的批判，同时一方面解释了列维纳斯存在之外的存在主义维度，另一方面也分析了巴赫金大时代的外位化维度。

五、总体符号学，“去总体化”方法和伦理符号学的视角

从目前为止所阐述的内容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庞齐奥符号学研究的一项重点是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和符号与生命、符号学科与生命学科、符号学与生物学的关系的主题化。近年来，在西比奥克开创性的努力付出和他的总体符号学的见解的贡献下，生物符号学已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庞齐奥尤为感兴趣的是西比奥克对地球上的符号活动与生命的相关性和模塑概念的解释。他以对话主义和形体间的存在于“符号活动的”（*semiosic*）和“符号的”（*semiotic*）层面上发展了西比奥克的相关理论，同时也回顾了巴赫金在其作品中表现出对生物学的兴趣。事实上，总体符号学研究的对象或生命符号学是生物符号学的范畴，庞齐奥将其分析为一个去总体化的总体。

尽管在对话主义和对生物符号学至关重要的模塑概念上很容易就将不同的术语联系起来，皮尔斯、巴赫金和西比奥克都围绕符号开辟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庞齐奥则不可避免地将研究视线转至雅各布·冯·尤克斯库尔（*Jakob von Uexküll*）的生物符号学的“功能性循环”（*functional cycle*）和对话与交流的关系。从生物符号学角度理解的对话主义与相关性、相关性、形体间存在的概念重叠，并预测了他性关系。

根据尤克斯库爾的观点，非人类生物与环境界的关系是稳定的，关注的是整个物种，相比之下，人类与环境界的关系发生变化，并且关注的是单个个体，其中有利有弊。由于“符形学”（*syntactics*）是人类内在的，特别是模塑模型，相对于特定历史的社会背景，人显然

能够进行构造,解构和重构基于有限元素基础上无限多的世界和世界观,这是一种人区别于动物的能力。因为符形学,人类能够探究环境界。正如人类能建造自己的世界,他也能使其濒临灭亡,毁灭它,甚至发展到危及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形式的地步。对符号的反省能力是人类特有的,以负责任的能力为基础。这些议题把对符号的反省转移到伦理符号学的方向上,从我2010年的著作《总体视角下符号学的岔路口:符号学与责任》(Sign Crossro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 Semio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的标题中可见一斑。

生命学科的一个共同的兴趣点连接着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视角和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和巴赫金的对话主义都能在生物学中找到基础。就像是巴赫金撰写了一篇当代的生机论的文章,但为求可信度署上生物学家卡纳耶夫·伊凡(Ivan I. Kanaev)的名字。无论如何,暂且不谈著作权的问题,庞齐奥坚持认为通过阅读巴赫金和西比奥克的相关研究,对话主义可以延伸到超出人类符号学的领域,并且与模塑一起被主题化为生物圈中所有相对的交流过程。这与西比奥克符号学的皮尔斯矩阵并不矛盾,因为对话的概念同样也在皮尔斯的思想体系的整体架构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西比奥克对当前符号学在全球的地位或“符号学说”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相比更为崇高的“科学”(science)和“理论”(theory)这两个术语,他更喜欢发展自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符号学说”(doctrine of signs)这一表达。约翰·洛克认为,一门学说,是一系列大体形成一个知识领域的原则和观点,随后,包括在这一传统表述上伯克利(Berkeley)接着是皮尔斯就代替了他的观点。庞齐奥继续采用西比奥克的方法和范式进一步跨越到伦理的范畴中。换句话说,生物符号学投影到哲学伦理学的领域,反之亦然。这在《当代符号学:从总体符号学到伦理符号学,一个对话的回应》(Semiotics Today.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a Dialogic Response)(2007)一书中也清晰地阐明。此书由马塞尔·达内西(Marcel Danesi)作序,保罗·科布利作引言。正如达内西所说,该书的关键问题在于生物符号学是否能在抽象的智力层面上用来统一身体和心灵,是否能想向拥有不同背景和文化的人显示他们是如何通过符号活动紧密相连的。就保罗·科布利本人的观点而言,他在引言中指出一个符号意识不仅对于理解当今世界的发展是不可或缺的,而且它对地球的未来发展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都需要我们反思现今符号学研究的当务之急。

与基因工程、神经生物学、药物研究等领域的生物医学发现相联系的伦理问题在伦理符号学中能找到统一且关键的观点,在伦理符号学中,它们是承认符号与人类符号活动中的价值不可规避的关系的符号研究的对象。但甚至在伦理符号学主题化的阶段之前,庞齐奥在另一本合著的意大利语专著《全球通讯感知》(Il sentire della comunicazione globale),2000参见 Petrilli, ed., 2014)中指出,伦理问题是导致产生了那些相同问题特征的两个总体中一部分,一个总体是生物符号学领域;另一个是全球通讯,这样的表达描述了当今社会再生产系统。伦理符号学贯穿其重要且基础的哲学方向,为充分解决焦点问题引入这种双重的语境化。

总体符号学提供的语境有利于在伦理符号学探索的中心上更好地理解问题。这里所指的不仅是语境的范围与数量方面,也包括质量方面。关于最后一点,“语境”(contextualization)是指关键的重构。总体符号学为伦理符号学提供一种基础性的和关键的方法。除了现象学和本体论顺序的双重语境之外,如果伦理符号学的相关问题要得到充分解决,其他类型的语境也是必要的。此处所指的是社会经济秩序的语境,具体而言是当今全球通讯生产的世界。

今天伦理符号学的任务是要从伦理的角度证实不同语境间的关系。今天,符号学与总体符号学或生命符号学都要承担起谴责不适宜全球发展的行为和任何威胁地球固有生物的生命责任。笔者在现今符号学研究中形容为“伦理符号学的机会”(semioethic turn)(参见 Petrilli 2010, 2012)是对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在符号与价值的关系,把人看作是符号动物的责任问题这个特殊兴趣的发展。

六、哲学见解和政治视角

正如庞齐奥在《不人道的人类》(Umano troppo disumano) (Athamor 2007年8月)一书中所见的那样,当今资本主义制度和其全球通讯生产体系中的“破坏性角色”(Walter Benjamin)已经扩展到了全球范围。毁灭与身份逻辑和对它的热衷相联系,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身份,即使是战争的代价,需要归属于一个社区或与他人进行联合,愿意捍卫和传播自己的“生活方式”(lifestyle),“主体性的崛起”(rise of subjectivity)及对其需求的夸张,技术进步、工作改良、商品增多、生产效率的提高,主张在“失业的工人社会”(society of workers without work, 参见 Hannah Arendt)的时期,除却其他因素,只以工作为依据将社会分解为社区。无论是对单个个体或集体身份如一个社会共同体,历史语言或某种形式的文化表达,在被认为与他人的孤立中,在与主导的意识形态趋势一致的组合的冲突关系背景下,身份不仅是虚假的,而且还十分危险,极具破坏性。

当今哲学的主流趋势,当代的哲学理念,现实的哲学都认可“理性的,政治的”(rational and political)动物般逆来顺受地适应并适应和屈从于残酷的现实法则,甚至可以同意极端的战争。这种方向是我们这个时代典型的同样是破坏性的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在“宽容的人文主义”(tolerant humanism)面具的伪装下,他者的差异性、他人,被设想为“孤独主体”(lone subject, 参见 Levinas)的线性时间本身的流逝所隐含的差异性,同步的他性,历史的他性,存在的他性,总体化意识的他性,这些他性一直都遭到否认。“同一性的人文主义”(humanism of identity)只会被“他性人文主义”(humanism of otherness)所抵消,后者是包括他者“人权”(human rights)的人文主义的一种形式。他性人文主义蕴涵着一种倾听的态度,是为他者花费的时间。他性人文主义明白现在从工作中分出的可用的时间是给他者,自我的他者,他者的他性的时间。如此设想的时间便构成了我们“真正的社会财富”(real social wealth),正如马克思本人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Grundrisse)中所提的那样。

庞齐奥的作品中对马克思的引用比比皆是,准确而言,如恩岑斯贝格尔(Enzensberger)所述,就是声称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那个马克思。笔者尤其想指出,正是庞齐奥把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由德语翻译成意大利语。虽然他有生之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进行相关研究,他曾在人生的最后两年呕心沥血地研究这些手稿,以期在马克思之后的数学研究进程中证实形成的解决方案和解释。

对符号和价值的重视就是重视符号活动的伦理、实用和关键的方面,继而是关注符号学的主题性和投射性的方面。所谓的巴里-莱切学派建议在这个方向上研究符号学。这个学派是以庞齐奥为首的,并受到庞齐奥新颖独创的学术作品中的启发,被他致力于旨在解决生活质量问题相关的科学研究的坚定决心所激励。《符号学未来的论文研究》(Tesi per il futuro anteriore della semiotica) (2006)界定了我们研究项目的方向,即符号学的未来是今时今日的当前世界。这种说法在笔者的2014年《符号学和伦理符号学》(Sign Studies and Semioethics)一书中进一步深化。

“符号学”(semiotics)这一术语不仅是一般符号科学的名称,它还指人类为了对符号进行反省并采取相应行动而使用符号的特异性倾向。强调这一点是极为重要的。没有哪个时期比当下这个时代更应该对未来负有责任,更有能力使未来的可能性置于危急之中。当今世界是对关乎整个地球所有符号生命和有生命的符号的命运进行决策的时间和空间。

从地缘政治的观点来看,当今世界的格局是身份的对立关系最终是战争的结果。正如庞齐奥在合著《战争世界》(Mondo di Guerra) (Athamor, 2005)向我们提醒的那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领土、国家、社区、国家联盟不是战争的结果。所有的世界秩序都是战争裁定的。和平是为了战争的和平,战后的和平,是通过战争建立的和平。战争建立边界,接着以边界为名,不断再扩边界。维护和平就是通过战争来维护世界秩序。由此看来,维护和平是维持战争。

庞齐奥认为有效和平的方向不同于习以为常的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战争的人文精神；不同于战争的和平和有和平感的和平；简而言之，真正的和平不同于以和平为特征的世界，这世界正如它本来的样子：遍野墓地的和平景象。

沟通的前提是对他者，对交谈者的主动态度。书面或口头的一句话传递给了他者，传递给了他者的他性，这句话就处于面对面关系的语境中，因此不具代表性的也不能被主题化。倾听他者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因为它们与世界、世界本来的样子、存在、工作的世界，支持战争观的工作-商品的时期相关。与只会造成“无穷无尽的战争”（infinite war）的“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相反，倾听是真正的预防性和平的条件。

通过他在语言哲学、符号学和语言学上的研究，庞齐奥形成了用于他对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持续讨论至关重要的方法论工具。符号和语言理论与他社会和政治领域的批判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他的研究与罗西-兰迪和亚当·沙夫密切相关，实际上，他已有大量的专题研究分析他们的理论。为了更好地，科学严谨地理解全球化的社会，反思当下的社会政治问题只能从符号学科所从事的符号和语言研究中获益。

庞齐奥在他题材广泛的著作中展开了身份的批评。基于身份逻辑的所有组合形成某种社区，在这个社区中、种族、性别、民族、社会与他人建立了相互对立的关系即白人与黑人，男人与女人，丈夫与妻子，社区成员和外来成员，同胞与外国人，教授与学生……正如所有的这些总体，这些组合的形成是通过认可组成它的，牺牲他性的不同元素。正如他在 1995 年《通讯，迁移，战争》（*La differenza non indifferente. Comunicazione, migrazione, guerra*）（new edition 2002）证明的那样，差异取消了，使得统一形成与其他组合和社区建立对立关系的组合。这种对立关系是维护一个社区相对其他社区特有的差异的必要条件。

作为一个名词，“军服”（uniform）这个词是军事语言的一部分，类似于名词“将军”（general）和“官员”（official）。这三个词都在某种程度上与一个社区、一个流派中的统一性的一般价值相联系，并服从于那个社区的官方话语。因为它们是基于差异和对立，所有类型，所有的身份被装进一套统一的军服里；这涉及到招募、对冲突的预计和武力的召唤。基于身份的差异，是组合的特征的差异涉及消除与单一性，同一，非对立差异相连的其他类型的差异。单一独特的差异性，基于他性逻辑的差异性，外在的身份，外界流派，自成一格，非互换性差异都是同一的差异，非对立的差异。以同一的差异为导向的他性类型是非相对的他性即绝对的他性。这特别是对单一个体的他性，而不是相对另外一个的他性，不是皮尔斯置于第二性的“相对他性”（relative otherness），而是皮尔斯置于第一性和新生性的“绝对他性”（absolute otherness）；这是处于不能被替代、互相同化的单一体关系中的他性。

紧随列维纳斯和他 2009 年在《倾听他者》（*L'Ecoute de l'autre*）中对自我与他者关系的分析，庞齐奥回归到列维纳斯主题化为面对面关系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中，也就是一种单一体间的关系、单个对单个的关系、独特对独特的关系。面对面的关系拒绝排斥他者和暴力的所有形式。这种关系的先决条件是交流和再现的所有形式，他者的对象化和提出的所有形式。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是不可逆转的。在这种关系中，自我在绝对意义上对他者负有责任即无借口地负责（Bakhtin），没有逃避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惠及他者，及对他者的回应。

这种异他性关系是话语或言说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在一个字里，我们可能会察觉另一个字的存在，这使得这个字在进行内部对话。自己所说的一个字尽管以它可能知道或不知道的方式，往往却指的是另一个字的意思，一个在绝对他性，他者中的字。字词偶然同义并不是它本身自觉为之。如上所述，这个字是对话式的因为它与其他字不可避免地牵连到一起，对话不是我们所选择的；相反，我们遭受对话的折磨，并受制于它。

庞齐奥在语句研究中表现出的其他问题包括语句与沉默的关系，语句和倾听的关系。庞齐奥探讨倾听和他所说的“缄默”（taciturnity）的艺术。最重要的是，他概述了相对于“沉默的语言学”（linguistics of silence）他所谓的“无言的语言学”（linguistics of taciturnity），其中

“沉默” (silence) 指没有倾听, 缺乏对他人语言的热情, 同时也指出了当今全球化世界中交流的特征: “沉默的语言学” (linguistics of silence) 和“沟通的沉默” (silence of communication)。自由且不带偏见的倾听意味着字间的邂逅, 但这个字不是一个人拥有、打断、占据、回溯或传递的字, 其意义可用意大利语理解为: “信守诺言” (mantenere la parola), “缺字” (mancare di parola), “说话” (prendere la parola), “回到他的话” (rimangiarsi la parola), “把握意义” (afferrare il senso); 如庞齐奥所描述的, 倾听意味着将字从被迫适应身份而存在的共同场域即沉默之地中解放出来。文学语言中的字在最大程度上实践了他性关系和倾听的做法。文学写作将字从身份逻辑和自身利益, 继而从有借口的责任的局限中释放出来。

他性问题与外来性 (怪异 *étrangé*) 问题是分不开的。从这个角度来看, 他者的问题就变成了外国人, 陌生人, 外星人的问题, 关系到他者语言的问题, 因此同样也是翻译的问题。在这个方面, 庞齐奥与布朗肖 (Blanchot)、巴塔耶 (Bataille)、巴尔特、德勒兹、德里达 (Derrida)、克里斯蒂娃与这些作者都进行了交流。他这个特殊的研究思路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陌生和外来性的状况, 这种状况不仅与一门外语而且重要的是与自己所谓的“母语” (mother-tongue) 相关。外来性作为确然的人的条件出现。它同样也是共存, 共有的生活, 共同生活形式的条件。此处的共同生活总体而言不同于目前存在的社区的所有形式, 它建立在自身利益的基础上, 其中, 每个单一个体只有在产生有益成果, 有职业谋生, 为社区服务的条件下才会被纳入考虑范围。相反, 植根于外来性, 关于外来人的 (extracommunitarian) 共同生活被描述为一个额外的, 空前的, 闻所未闻的社区, 在这个社区里, 他者是目的而不是一种手段。作为一个临时的结论和综述, 保罗·科布利在 2010 年《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中深刻地分析了庞齐奥, 我仅以该书的条目为这篇简短的介绍作结:

奥古斯托·庞齐奥生于 1942 年, 系巴里大学的符号学家。庞齐奥是一位著名的理论家, 特别是在对话, 异他性, 主体性和全球通讯领域。他因与沙夫、列维纳斯、巴尔特、克里斯蒂娃、巴赫金、西比奥克和罗西-兰迪的合作, 友谊及相关人物的分析著作而闻名。他也有关于皮尔斯、维特根斯坦 (Wittgenstein)、马克思和西班牙的彼得的著作。他曾与包括朱莉娅·庞齐奥 (Julia Ponzio)、科西莫·卡普托 (Cosimo Caputo)、马西莫 (Massimo Bonfantini)、尤其是与苏珊·佩特里利 (Susan Petrilli) 等众多学者进行合作研究。

尽管他在众多兴趣领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 可以说, 他思想的核心在于一个单一的概念: 不是作为自主的, 而是作为一种持续的需求的对话。这是一个对话的概念, 在不断超越折中的自由观念即谈判和妥协的观念上, 对话概念实际上是反对这样的实施方案, 在对话中认可强迫和需求而不是自我识别的善意。这种对话的框架当然是由巴赫金提出的; 正如庞齐奥和佩特里利简洁地表述所言:

巴赫金认为对话不是我们决定采取主动性举措的结果, 它是强加于人, 而人为其所困。对话不是向他者开放的结果, 而不可能将其封闭的无奈之举。(Ponzio and Petrilli 1998: 28) [符号研究的标志, 可访问网页 www.augustoponzio.com]

但在庞齐奥之后, 要是认为对话仅仅是巴赫金和列维纳斯的精妙阐释便大错特错。正如庞齐奥所说的, 对话不应该被看作纯粹为自我肯定而服务:

相反, 如列维纳斯提出的, 对话是不可能逃离他者的被动见证; 它被动见证了一个无法避开他者的事实, 见证了除了被要求对他者负责为他者考虑的主体采取的主动性,

同他者牵涉到一起的状态。在对话证明了他性（他者的或自我的）关系的意义上，“我”（I）是组成式结构式的对话。（Ponzio 2006c: 11）[被质疑的我：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和西方理性批判，可访问网页 www.augustoponzio.com]

对庞齐奥而言，对话提供了一个尤其是在全球通讯时期下解决交流和本体关系的关键性的工具。

在吹捧资本主义包容性中，世界已陷入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自身的排斥逻辑中。这一点，在全球通讯中清晰可见。资本主义所压制的并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的是他作品中所表现的对话的强制性。受西比奥克的启发，尽管在他形成的“传播生产”（communication-production）中认为应对全球传播事关紧要的利益摆在重要的地位并且它已潜在地破坏着地球，庞齐奥在总体视角下观察并非固定于人类符号学的符号活动。就理论而言，庞齐奥认为坚持符号活动扩展到更大领域是有必要的。主要受《符号的自我》（Semiotica dell'io）（Sebeok et al. 2001）中西比奥克对符号自我的分析的启发，庞齐奥没有停止纯粹的社会观察。相反，他在研究中深入地分析在对话被重复阻挠的沟通过程中所有物种的全部行为的符号过程。虽然全球通讯的暴君统治和其在“通讯生产”（communication-production）的孵化是庞齐奥的研究缘由，他也从非语言交流的否定中确定了对话的一般性压制。

庞齐奥对“身份”（Identity, 参见 Ponzio 2006c）类别的批判揭示了“对自我的关爱”（care of the self）事实上只能产生于对话的“对他者的关爱”（care of others），其中“他者”（others）必须意味着符号域的整体。在这个意义上，庞齐奥就不得不勾勒出未来伦理符号学的轮廓。（PC）

基于此，对庞齐奥的传记文献的顺序进行排列的考虑是有道理的。自1980年以来，他是语言哲学和普通语言学系的全职教授，自1980年系意大利巴里阿尔多莫罗大学的名誉教授，在那里，他将其毕生所学传授于莘莘学子。庞齐奥从事教学活动，研究和写作的时间超过50年，并继续他的博士研讨会和阶段性的出国讲学。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语言哲学，普通语言学，符号学，文学理论。他从1966年开始讲授理论和道德哲学，1970年教授语言哲学，1995年至1997年教授符号学，1997年至2001年讲授文本符号学，1995年至1998年讲授通讯原理，1998年除了坚持语言哲学的讲授外，另外还开设了大众媒体的普通语言学和符号学这些课程。

他于1981年在巴里阿尔多莫罗大学外国文学和语言系创立了语言哲学研究所，1999年之前为研究所所长。1999年，他创办的语言学实践和文本分析系，2005年前担任系主任。并于1988年引进了一个博士项目“语言理论与符号学科”并至2012年以前担任该项目的主持人。

他于1990年与海法大学克劳德·甘德尔曼（Claude Gandelman）创办了最初的年刊《艺术、文学、符号学、哲学》（Athnor, Arte, Letteratura, Semiotica, Filosofia），随后自2014年起作为系列丛书出版。“熔炉”（Athnor）是一个阿拉伯词，它让炼金术士在实验室里将混和的所有元素冶炼成金。除了意大利的出版商如米兰的邦皮亚尼（Bompiani），佛罗伦萨的“新意大利”（La Nuova Italia）、巴里-罗马的拉泰尔扎（Laterza）、米兰的拟态（Mimesis）合作之外，庞齐奥还出版了多种语言的著作，合作的出版商还有柏林的德古意特（Mouton De Gruyter），阿姆斯特丹的约翰·本杰明（John Benjamins）、巴黎的哈尔马丹（l'Harmattan）、马德里的（Catedra and Corazon）、多伦多大学出版社、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视野（Nueva Vision）、加拿大的巴尔扎克出版商（Editions Balzac）、萨格勒布的克尼加（Skolska Kniga）、渥太华的莱格斯（Legas）、伦敦的偶像图书（Icon Books），巴西圣保罗的文本（Contexto）、

巴西彼得罗波利斯的 (Vozes)、巴西圣卡洛的若昂出版商 (João Editores)。作为翻译家和编者，他为把列维纳斯、巴赫金、亚当·沙夫、罗西-兰迪的思想传播到意大利和国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第一部关于上述思想家的专著分别是：1967 年对列维纳斯分析的《人际关系》(La relazione interpersonale)，1974 年《亚当·沙夫研究的人，语言和知识》(Persona umana, linguaggio and conoscenza in Adam Schaff)，1980 年《巴赫金，俄罗斯符号学的起源》(Michail Bachtin. Alle origini della semiotica sovietica)，1988 年《罗西-兰迪和语言哲学》(Ferruccio Rossi-Landi and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每本著作一经出版后均会再出增订版。

此外，庞齐奥也推动了巴赫金和巴赫金一派的大量研究作品的意大利语的翻译工作。其中包括瓦伦丁·沃洛希诺夫，帕维尔·梅德韦杰夫 (Pavel N. Medvedev) 以及生物学家伊凡。他也推动了意大利的马克思研究，于 1975 年出版了意大利版的马克思的数学手稿 (扩大修订版 2005)。

此外，庞齐奥为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在意大利的传播作出了突出贡献。除了在我所在系部的赞助支持下，西比奥克多次访问巴里大学与师生见面交流的工作以外，庞齐奥还发行了几本西比奥克专著的意文翻译版，并与本人合作撰写了两本研究西比奥克思想的专著，其中有 2001 年的《西比奥克与生命符号》(Sebeok and the Signs of Life)；2002 年的《符号与生命：西比奥克的总体符号学》(I segni and la vita. La semiotica globale di Thomas Sebeok)；第三本是 2004 年与笔者，马塞尔·达内西合著的《总体符号学，符号中的身体：走近西比奥克》(Semiotica globale. Il corpo nel segno: introduzione a Thomas Sebeok)。此外，庞齐奥于 2001 年与西比奥克，笔者合著了《自我的符号学》。

对于其他意大利学者，庞齐奥特别关注他的导师、哲学家朱塞佩·塞莫拉里 (Giuseppe Semerari) 的著作，以及哲学家、符号学家罗西-兰迪和哲学家数学家乔凡尼·瓦伊拉蒂 (Giovanni Vailati)，皮亚诺 (Giuseppe Peano) 的学生。自 1988 年第一本关于罗西-兰迪的专著《罗西-兰迪与语言哲学》之后，庞齐奥与邦皮亚尼和马尔西利奥 (Marsilio) 已再版了罗西-兰迪的作品，约翰·本杰明出版了英文作品集《符号与非符号之间》(Between Signs and Non-signs)，并且在 2008 年出版了他关于罗西-兰迪的第二本专著《语言、工作和全球市场：重读罗西-兰迪》。

作为对语词符号学特点及其与意识形态关系——并最终表现为符号、价值与意识形态关系的研究，尤其关于罗西-兰迪和他的意识形态批判的研究的一部分，庞齐奥在与国际罗西-兰迪网站和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的合作下，于 2002 年 11 月 14 到 16 日在巴里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举办了致力于探讨罗西-兰迪符号学当今价值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次学术讨论会的一系列成果于 2004 年作为《熔炉》系列丛书的一卷出版，标题为《非物质劳动》(Lavoro immateriale)，来自国内外的发言人为之贡献良多。自罗西-兰迪于 1985 年过世后，庞齐奥就不断地推广他的研究，再版其著作，建立了作为国际符号学研究协会和罗西-兰迪网站一部分的上述的罗西-兰迪网络，此外，还做了大量的与之相关的公共讲座，组织了多场探讨罗西-兰迪的会议和研讨会。

罗西-兰迪与邦皮亚尼于 1978 年出版了作为艾柯主编的系列丛书《现场符号学》(Il campo semiotico) 中的《符号学和意识形态》(Semiotica e ideologia)，在庞齐奥的推动下发行了第五版 (2012)，最近庞齐奥于 2012 年 4 月在撒丁岛的卡利亚里大学开设了关于罗西-兰迪的系列课程。课程涉及的主要议题包括：1. 符号与意识形态的关系；2. 语言和非语言符号系统关系中的社会再生产；3. 社会规划与全球通讯；4. 语言学与经济学的关系；5. 对通讯生产的批判；6. 罗西-兰迪的语言、模塑和沟通。

2005 年 12 月 13 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庞齐奥被匈牙利符号学协会授予荣誉证书，推举“奥古斯托·庞齐奥博士教授”为荣誉会员，特别表彰他在纪念，延续已逝的罗西-兰迪的社会符号学活动上取得的重大成就。该证书由秘书长盖佐·巴拉兹 (Géza Balázs) 和协会

主席维尔莫什·福格特 (Vilmos Voigt) 签署。

近年来,庞齐奥的几本翻译著作和葡萄牙语原著在出版商瓦迪米尔 (Valdemir Miotello) 的积极支持下都已出版,该出版商是巴赫金的推崇者,巴西圣保罗卡洛斯大学的教授。2010年10月和11月,庞齐奥应邀开设关于巴赫金及该派别的系列课程。之后在2012年3月在圣保罗卡洛斯大学,位于坎皮纳斯的坎皮纳斯州立大学,位于阿拉拉夸拉的圣保罗州立大学也开设这一课程。在巴西同事的要求下,课程集中于巴赫金和其派别,他的语言哲学,符号学、语言学、伦理学和美学理念,特别是关于意义、价值、责任和艺术话语的问题。这些课程是围绕以下大致的标题组织进行的:“关于巴赫金构建新世界的研究:共同生活”;“巴赫金和其派别分析人文学科和对话科学的新方法的作品”。所提到的讨论主题包括(译自葡萄牙语):1. 引文、意译、戏仿、解释和翻译中自我的他者的文字;2. 文学的话语体裁和社会学科;3. 乔姆斯基的语言学、政治经济与社会意识形态;4. 人文学科和文学写作中他者的文字;5. 符号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科中他者的文字:巴赫金、维果茨基 (Vygotsky)、洛特曼 (Lotman)、普罗普 (Propp)、列维-斯特劳斯 (Lévi-Strauss)、福柯.....;6. 文学写作和倾听的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坡 (Poe)、阿尔托 (Artaud)、卡尔维诺 (Italo Calvino)、帕索里尼 (Pasolini)、列维纳斯 (Lévinas)、德里达.....;7. 全球通讯语言的伦理符号学;8. 回应他者的伦理:巴赫金、布伯 (Buber)、列维纳斯;9. 道德责任与政治责任;10. 构建新世界同时性语言中的对话与复调:共同生活;11. 言语创作的美学;12.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3. 马克思主与语言哲学;14. 文学与美学的问题;15. 弗洛伊德主义;16. 负责任行为的哲学;17. 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流行文化;18. 言说的结构;19. 模塑与写作;20. 怪诞的身体和社会秩序的批判。

在英国伦敦城市大学的保罗·科布利主编的邀请下,庞齐奥的作品《被质疑的我:伊曼纽尔·列维纳斯与西方理性批判》(The I Questioned: Emmanuel Levinas and the critique of Occidental reason) 作为《主体问题》(Subject Matters) (vol. 3, 1, 2006) 特刊的卷首发表。该卷以书的篇幅包含了庞齐奥关于列维纳斯的研究,大量学者写的一系列关于对庞齐奥所分析的列维纳斯的观点进行讨论的论文紧随其后。这本文集包括以下内容:亚当·扎卡里·牛顿 (Adam Zachary Newton) 的《我的自我的双重解答》(The I's double-answer); 迈克尔·史密斯 (Michael B. Smith) 的《理性与本土他律的批判》(A critique of reason and autochthonous heteronomy); 罗伯特·贝尔纳斯科尼 (Robert Bernasconi) 的《身份的倒戈》(The defection of identity); 格雷厄姆·沃德 (Graham Ward) 的《自我放空和类比的问题》(Kenosis and the problem of “analogy”); 罗杰·布格拉耶夫 (Roger Burggraeve) 的《从自我到他者再回归自我,列维纳斯重新定义的主体》(From the self to the other and back to the self – otherwise. Levinas' redefinition of the subject); 贝蒂娜·贝尔戈 (Bettina Bergo) 的《身份:逻辑与文化的对抗,基于魁北克的一些言论》(Identity: logic vs. culture, some remarks on Québec); 威廉·保罗·西蒙斯 (William Paul Simmons) 的《具体的抽象体和“人的权利”》(Concrete abstractions and the “Rights of Man”); 最后,安妮特·艾若诺威克斯 (Annette Aronowicz) 的《列维纳斯与政治》(Levinas and politics)。整个合集由保罗·科布利作序。

我们可看出庞齐奥的作品是从伦理符号学的角度解决逻辑,意识形态和对话主义的问题,意在突出他研究主题性,投射性的方向,笔者在国际符号学协会的支持下推动并组织了“逻辑、对话主义和意识形态”(Logica, dialogica, ideologica) 的国际学术讨论会,会议于2002年2月13日至16日在巴里大学举办,旨在庆祝庞齐奥的60大寿。该讨论会的研究结果于2003年发表在笔者和凯利法托 (P. Calefato) 编辑的《逻辑,对话,意识形态,功能和过量之间的符号》(Logica, dialogica, ideologica. I segni fra funzionalità ed eccedenza) (Mimesis, Milan) 上。与讨论会相关的是,同时参会者的贡献远远超越了会议本身,另一家国际编辑企业也为了庞齐奥于2004年出版了题为《伦理符号学视角下的意识形态,逻辑和对话》

(Ideology, Logic, and Dialogue in Semioethic Perspective) (148-1 / 4, edited by myself) 的《符号学》特刊。此卷呈现了众多学者的贡献：卡塞尔大学的温弗里德·诺斯 (Winfried Noth)；维也纳大学的杰夫·伯纳德 (Jeff Bernard) 和格洛里亚·维萨尔姆 (Gloria Withalm)；圣保罗大学的露西亚·圣埃利亚-布拉加 (Lucia Santaella-Braga)；瑞典隆德大学的戈兰·桑尼逊 (Goran Sonnesson)；宾州加利福尼亚大学的文森特·卡拉皮埃托 (Vincent Colapietro)；德克萨斯圣托马斯大学的约翰·迪利 (John Deely)；瓦伦西亚大学的朱利亚·科拉伊奇 (Giulia Colaizzi)；蒙特维的亚大学的丽莎·比哈尔 (Lisa Block de Behar)；苏黎世大学的克里斯汀·永贝里 (Christine Ljungberg)；勃艮第大学的尼古拉斯·博内 (Nicolas Bonnet)；多伦多大学的马塞尔·达内西。这项倡议最先是西比奥克策划并至 2001 年离世前担任主编。

由笔者 2007 年编辑的双语卷和《倾听艺术的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 中是一本关于庞齐奥科学研究的论文集，同时多位学者也为之作出了贡献，包括保罗·科布利，朱塞佩·米宁尼 (Giuseppe Mininni)，文森特·卡拉皮埃托，埃罗·塔拉斯蒂 (Eero Tarasti)，马塞尔·达内西，卡莱维·库尔 (Kalevi Kull)，弗洛伊德·梅里尔 (Floyd Merrell)，温弗里德·诺斯，露西亚·圣埃利亚，科西莫·卡普托，约翰·迪利，弗兰克·尼塞尔 (Frank Nuessel)，克劳德·甘德尔曼，拉蒙·阿尔瓦拉多 (Ramon Alvarado)，霍斯特·鲁斯罗夫 (Horst Ruthrof)。2008 年由笔者再次主编的另一意大利文集也相继发表。

2010 年，保罗·科布利撰写了关于庞齐奥研究条目的《劳特利奇符号学指南》，书中他恰当地强调了对话，他性，沟通和人际关系这些庞齐奥研究中的重要话题。

为庆祝庞齐奥 70 大寿 (2012) 的另一本由笔者主编的题为《写作、声音、事业》(Writing, Voice, Undertaking) 的著作于 2013 年出版，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八十位学者贡献的作品。通过阅读庞齐奥的作品，作者们从不同的领域和不同的利益着手，解决与沟通，阐释，翻译，批判相关的主题和方法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作为符号学批判的后者在它们的符号共同利益中结合了历史，文学，哲学，社会学以及经济政治的批判。与此同时，符号学批判也是对包括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在内的伪科学专长，偏见和意识形态分离的所有形式的批判。

作为对研究兴趣和名称语言总结的一种方式，即使这种方式是暂时和零碎的，下文是庞齐奥的研究领域，主题和至今其创作过程中他所关注的作家的一个综合列表。他的作品本身就是构成一个个研究路途中的里程碑的不同文字，不同声音和名称之间发生对话的结果。

领域：哲学、符号学、语言学、经济学、逻辑学、艺术、文学、文化人类学、心理语言学、精神分析学、建筑学、艺术话语——音乐、戏剧、电影、绘画、设计、漫画和连环画。

主题：涵义、意义、指称物、解释项、言语和非言语符号，人际关系、对话、辩证法、责任、非功能性、单一性、人本主义、他性、人类法则、通讯生产、政治经济的批判、意识形态、价值观念微分学、句法、语义学、语用学、隐喻、翻译、语言起源。

作者和作家：阿里斯托法内斯 (Aristofane)、阿尔托、巴赫金、贝内 (Bene)、本杰明、巴尔特、巴塔耶、布朗肖、博尔赫斯 (Borges)、乔姆斯基、德勒兹、德里达、福斯科洛 (Foscolo)、福柯、弗洛伊德、克尔凯郭尔 (Kierkegaard)、莱奥帕尔迪 (Leopardi)、列维纳斯、曼恩 (Mann)、曼佐尼 (Manzoni)、尼采 (Nietzsche)、马克思、莫里斯、奥威尔 (Orwell)、帕索里尼、皮尔斯、彼得·希思帕尼斯、柏拉图、坡、罗西-兰迪、沙夫、西比奥克、塞梅拉里、斯特恩 (Sterne)、萨斯 (Szasz)、斯威沃 (Svevo)、瓦伊拉蒂、韦尔迪廖内 (Verdiglione)、维特根斯坦。

在一篇题为“侧记”的简短传记文献说明 (参见: www.augustoponzo.com) 中，庞齐奥解释了他的理论兴趣，特别提到上文概述中的作者，在以下方面特别是巴赫金和其派别里的列维纳斯，马克思，沙夫和罗西-兰迪：“尽管他们之间也存在分歧，我已经研究了这些作者的共同之处：不论研究的对象是什么，也不管分析的方向是什么，人类个体的生命在他/她具体的单一性中都不能从无理由的对他人命运的参与中被分割出去。

本文原题为“*Semiotics and Philosophy of Language in Augusto Ponzio*”，原刊载于 *International Handbook for Semiotics*, edited and Apologia, pp. 1-29, by Peter P. Trifonas, Chapter 32, pp. 691-717. Dordrecht, Springer, 2015.